

大学之道

是人文主义关注的中
最高理想。但是，由

于无论现代科学技术，社会科学，还是人
文学科的发展，都带来了学科普遍而深入
的专业化，相应地社会的职业也日益专门
化，大学教育中的个性充分发展的人文主
义理想因此就面临巨大的挑战。由于学科
的专业化和分化，不同学科之间缺乏沟通
各个学科所从事的研究，所开设的课程
甚至同一学科的不同分支所从事的研究之
所开设的课程与其他学科或者其她分支之
间似乎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因此学生所学到的
无非是一些支离破碎的知识。人类作为整
体所建立的知识反而变成了使人在知识上
甚至在观念和行为上隔离开来的栅栏。

杨东平主编

文 化 出 版 社

杨东平主编

文 区 出 版 社

大学之道

是人文主义关注的中
心，也是现代教育最高理想。但是，由

于无论现代科学技术、社会科学，还是人文学科的发展，都带来了学科普遍而深入的专业化，相应地社会的职业也日益专门化，大学教育中的个性充分发展的人文主义理想因此就面临巨大的挑战。由于学科的专业化和分化，不同学科之间缺乏沟通，各个学科所从事的研究、所开设的课程，甚至同一学科的不同分支所从事的研究之间似乎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因此学生所学到的无非是一些支离破碎的知识。人类作为整体所建立的知识反而变成了使人在知识上和行为上隔离开来的栅栏。大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之道/杨东平编. —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8

ISBN 7-80676-387-2

I. 大... II. 杨... III. 高等教育—研究

IV. G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0690 号

大学之道

主 编 / 杨东平

责任编辑 / 梅文革

封面装帧 / 王建纲

出版发行 / 文 汇出版社

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 200002)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上海浦东联印刷厂

版 次 /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40 1/16

字 数 / 295 千

印 张 / 17.625

印 数 / 1—6 000

ISBN7-80676-387-2/G · 211

定 价 / 25.00 元

前言：重建大学制度

杨东平

世纪之交，错综复杂的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从几个不同的方向上，又一次聚焦于高等教育。1998年北京大学在百年校庆之际，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中国高等教育树立了雄心勃勃的新目标。确立这一目标的大学从清华、北大两校迅速扩大到十余所。的确，人类文明发展到以知识社会、知识经济为标识的时代。知识权威的建立，大国的兴衰和大学的兴衰之间的关联，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而令人倍加关注。然而，关于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怎样建设一流大学的讨论却众说纷纭。

对于亿万学生和家长而言，真正激动人心的福音，是大学扩招。1999年春天，国务院决定高等学校扩大招生，从而为长达十余年的关于高等教育该不该大力发展的讨论做出了官方结论。这一决策虽然是由经济学家为拉动短期市场内需而提出的，却成为对被延误的教育发展必要的矫正。我国高等学校的毛入学率，1990年仅为3.4%，1996年为7.1%。由于1999年起的大规模扩招，到2000年这一指标已经达到约11%，可望提前于2005年以前就达到15%的指标，从而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①

争取“世界一流”的纵向进取，与实现“大众化”的横向拓展，构成了当前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二维坐标。然而，仅凭这两个维度，并不足以识其全豹。新世纪之初中国社会的复杂变化——诸如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中国社会的市场化、城市化进程，社会结构的分化，消费主义和大众文化的兴盛，贫富差距、城乡差距拉大，严重的腐败现象等等——都在显著地影响着大学的培养目标、教育价值和教育品质。在高等教

育凯歌行进、迅速扩张的过程中,校园里弥漫着浮躁、浮夸的风气,导致人们对质量滑坡、文凭贬值的深切担忧;高昂的学费造就了庞大的贫困生阶层,正在改变着农村学生的升学意愿;严重的人才流失仍没有停止,甫出校门的大学生,却面临就业还是失业的巨大压力;以“研究高深学问”为旨的大学,弥漫着浓重的官气,唯上是从,跑“部”前进,充满了大跃进式的豪迈和各种各样的高指标,运行着官、产、学、商各不相同的机制;屡禁不止的教育腐败、学术腐败,使学校终于失去了“净土”之誉,被诟病为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顽固堡垒”……来自学界和社会各界的诘问强烈而尖锐:对于一流大学的建设而言,我们真正的差距究竟何在?大学仅仅是经济建设的发动机、科技进步的孵化器?大学参与社会服务,是否意味着应当成为超级市场和加油站?高等教育真的应该成为富人的盛宴?……

我们必须思考一些更为基本的问题。首先需要回答的,就是“大学是什么?”比较而言,对它的反问“大学不是什么”的回答更为简明扼要:大学不是行政机关,不是官场,不是企业,不是商场,不是简单的政治工具或经济工具。中国高等教育需要新的思维和思想的深度,需要品质的改善和境界的提升,需要文化的转换和制度创新。在社会现代化的坐标上,现代大学的现代性,正是由这种文化和制度说明的。这个任务和使命,一言以蔽之,就是重建大学制度和大学精神。

1941年,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写下了他心中的“大学之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②。他将《大学》开篇的名言修改一字,将“亲民”改为“新民”,使这一千年古训幡然回新,充盈了“五四”学人的文化精神和理想。

所谓的“大学之道”,在形而上的层面是大学精神,在操作性的层面就是大学制度。大学精神和大学制度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大学精神产生于现代大学制度之中,大学制度蕴涵、滋养着大学精神,超拔的大学精神附丽于坚实的大学制度才得以薪火相传。1852年,英国的红衣主教纽曼所著《大学的理念》,首次深入地探究了大学的功能、目标和基本价值,此后,每一代知识分子都在继续探究、深化这一命题。在近代以来极其剧烈的社会变迁中,大学作为一个能够延续几百年而长盛不衰、常青常新的机构,是十分罕见的。尽管时移势易,社会和大学的面貌已发生深刻的变化,大学精神的源流却始终未曾中断。学术自由、教授治校、通才教育、学生自治之类大学的基本价值和基本制度,使大学成为真理探索、文化传承和创新的不

竭源泉。

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之后，“现代企业制度”早已深入人心，然而，对于“现代大学制度”，人们不仅依然陌生，而且余悸尚存。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机构，大学以研究高深学问、培养高级人才、从事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为旨，其管理行为与企业和行政机关根本不同。企业以效率为中心，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标；行政机关作为典型的科层组织，实行以权力为中心的“官僚制”管理。19世纪洪堡创立柏林大学，奠定“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学习自由”的原则，它便成为现代大学的基本价值和基本准则。大学以“学术自由”为核心价值是由其宗旨决定的，因为自由是追求真理的前提条件。美国高等教育的“三A原则”是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学术自治(Academic Autonomy)、学术中立(Academic Neutrality)。虽然学术自由是一个流动和发展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具体的社会环境中，有着不同的规范和限度，但其维护学者自由地从事学术研究，免受非学术力量的干预，从而保持学术的丰富性(高水平和多样性)的基本精神，是清晰和一贯的。它在实践中有两个基本方面，即界定学校与政府的关系和建立由学者实行学术自治的组织。后者正是从中世纪起形成的大学组织的传统。

大学制度当然包括许多具体制度。例如学术评价制度，教师的聘用、考核和职称评定，教学制度和学籍管理，校长的遴选和产生，财务、资金、校产的管理等等。但大学的核心制度、大学制度创新的根本要义，就是确立“学术本位”的价值，在大学实行学术内行的民主管理，使教授真正拥有学术权力。正像一个不以赢利为目标、经理(厂长)没有经营权的企业不是真正的企业一样，一个没有奠定学术自由的价值观，教授不拥有学术权力的大学，不可能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更遑论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现代大学制度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为世界各国所共享，也曾对我国早期的高等教育产生过全面而重要的影响。“五四”时期新文化的启蒙，形成了全新的文化气象和影响深远的新教育运动。学术自由、教授治校、教育民主、儿童中心等成为普遍的常识和大范围的现实，从而形成了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一个重要的小传统——由“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推动、塑造的“‘五四’教育传统”。

近些年来，我们呼唤大师、呼唤创造型人才和创造性成果的心情不可谓不切，措施也不可谓不力，既有“十万年薪”的“长江学者”，又有吸引“海归”的百万年薪；许多地方还开出了“筑巢引凤”、延揽院士的天价。然而，应当看到，

人才辈出、大师云集，主要是一种制度文明的产物，不是急功近利的政策能够速成地催化出来的。创建优秀大学，钱无疑十分重要，但还有比钱更重要的。否则，正如人们调侃的，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应集中在海湾国家；否则，也无法解释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西南联合大学何以能培养出整整一代优秀学生、产出如此丰富的学术成果；无法解释当年远比现在更为贫弱的经济市场，何以能培育出厦门大学、南开大学这样优秀的私立大学，能造就陈嘉庚、张伯苓这样伟大的教育家。当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群星璀璨、风云际会的气象，无非说明了学术自由、兼容并蓄、教授治校这样的大学精神和大学制度，才是大师生长最为重要的环境。这种制度文明有许多细微的方面。当时大学能够不拘一格地聘任梁漱溟这样的无学历者为教授，接受吴晗这样的文科奇才，并非大学制度尚不健全时的奇闻逸事。1940年，教育部颁布的《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资格审查暂行规程》，仍为这类特殊人才开辟了通道。它在十分明确而具体地规定了教授、副教授、讲师的任职资格、待遇和授课时数的同时，规定“在学术上有特殊贡献，而资格不合规定者，经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四分之三以上委员认可，可任教授副教授”。^③这种制度安排，肯定是比某一个人的慧眼和胸襟更有价值的。

面向未来，我们需要前瞻也需要回顾，需要创新也需要继承，需要建设，需要管理，但尤其需要推进体制和制度层面的改革。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以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的改革为中心，凸显了制度变革、制度建设的特殊重要性。时至今日，仍需认识在我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相当长的时期内，陈旧体制、制度的束缚仍然是社会发展最顽固的桎梏；体制、机制、政策等制度层面的改革，仍然是对社会生产力最重要的解放。有学者提出，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之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提法已经失去当初的针对性。政府职能的转变，应当超越唯经济论、GDP至上的功利主义，以建设政治文明、提供公共产品和维护市场秩序为主，应“以制度建设为中心”。也有人比照流行的说法，提出“制度是第一生产力”。无论制度第一、科技第一，还是教育第一，无非是强调某一事物重要性的形象说法。社会现代化作为整体的演进，并不存在这样唯一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如果非要从中选择一个，与其他种种形式的决定论相比，我更为认同“制度决定论”。

为重新焕发中国大学的精神活力和创造力，高等教育改革的最基本任务，就是恢复大学的自主性，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北京大学率先启动的教

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已经将这一任务提到了议事日程。改革必须接触重大问题，否则就没有改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北京大学这一引起轩然大波的改革虽然阻力重重，在方案的具体设计上也多有可完善之处，但这种自我变革的勇气，这种适应社会进步的文化自觉仍然令人钦佩，使人感悟到北大某种独特的精神特质。正是这么一点高贵的“文化基因”的孓遗，才使北大成为北大，迥然有别于其他的所有大学。而东北师范大学进行的探索——在院系成立教授委员会——也给我们某种启示：在我国现实的国情中，大学制度的创新并非天方夜谭。我们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无所作为的庸俗心态，用建设性的探索清除那些至今仍在束缚我们的思想障碍、观念障碍和制度障碍。

好在现代大学的制度建设并非无源之水，也无须凭空创造。我们不仅有一个可以继承的“五四”教育传统，更有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实行、相当成熟的“国际经验”。而且，我们还有近在眼前、可资借鉴的“他山之玉”。香港科技大学用短短 10 年的时间，成长为国际知名的优秀大学，构成一种值得认识的“现象”。其迅速崛起的关键和“秘诀”，就是“完全采用国际上最先进的学术管理制度，其要点就是‘教授治校’”。^④ 同样争取成为“世界一流”，台湾大学校长陈维昭提出台大未来的目标是“纯净、自主、均衡、卓越”^⑤，将“纯净”作为重要的追求，不也是发人深省的吗？为此，本书不避累赘，选编了一组介绍国内外学术自由、教授治校、校园政治、研究生培养的文章，以求见其全豹。

我国现行的大学制度，大致是中国文化传统、“五四”新教育和 1949 年之后新中国的教育实践这样三种遗产的产物。“文革”和“文革”前，“左”的路线对教育的扭曲、对学术的戕害和对知识分子的伤害，是不应被忘却的，是矫正我们当前坐标的重要参照。如果我们不能批判性地反省我们的教训和苦难，那么历史并不会自动地成为未来的借镜。这便是本书包含了大学往事之维的原因。

本书选辑的许多文章，都在报纸、网络和坊间广为流传，已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教育界内外、海内外众多知识分子的批评、建言，他们的深思熟虑和远见卓识，体现了“公共知识分子”的参与热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重新弘扬一个教育古国的大学之道和文明之光的殷殷之情，溢于言表。如果这本集子，能进一步传播和放大他们的思想，则吾愿足矣。

2003 年 6 月 30 日 于北京万柳

注释

- ① 按照美国社会学家马丁·特罗的划分,适龄青年的高等学校毛入学率低于 15%,属精英型高等教育;达到 15%—50%,为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超过 50%,为普及化阶段。
- ② 梅贻琦:《大学一解》,《清华学报》,第十三卷第一期,1941 年 4 月。
- ③ 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五卷,第 301 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 年。
- ④ 见本书所选《“香港科大现象”及其启示》一文。
- ⑤ 童清峰:《从台湾一流到世界一流》,《亚洲周刊》,2002 年 3 月 24 日。

目 录

前言：重建大学制度

杨东平(1)

1

大学的理念

大学的理念	童世骏(3)
大学的使命：公民科学与自由教育	李 猛(10)
大学之魂	肖雪慧(16)
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	丁学良(25)
人文学科与通才教育	韩水法(40)
人文学者的社会责任	(美)杜维明(45)

大 学 诊 断

中国教育：垄断的最大牺牲品	王先庆(51)
教育改革三题	马立诚(54)
忧思中国教育	丘成桐(58)
北大改革的大方向与可行性	潘懋元(61)
警惕博士学位贬值	姜义华(71)
我们还有选择专业的自由吗？	赵毅衡(73)
学术的量化和量化后的学术	黄安年(76)

现代大学之路

中国能不能办出世界一流大学	丁学良(83)
---------------	-----------

谁想要世界一流大学	韩水法(101)
中国需要建一所全新的世界一流大学	汤 敏(106)
制度创新与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张应强(112)
大学扩张的道德边界	陶 人(120)
通过调整大学的布局达到大学入学标准的 公正合理	马克义(126)
关于研究生制度的讨论	汪丁丁(134)
研究生教育制度必须改革	顾海兵(136)
大学不要学术浮夸和“大票子”	朱学勤(143)
还教育更多的自治色彩	秦 晖(145)
教授委员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	刘 微(148)
改革要有新思路	甘 草(154)
从深层次思考大学生就业问题	汤 敏(157)

2

前事之镜

中国现代大学的“制度设计”	谢 泳(167)
清华大学与通才教育	智效民(172)
我们对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	黄药眠(184)
过去的大学和现在的大学	黄俊伟(190)
大楼与书桌	曾昭奋(196)
清华园里可读书?	曾昭奋(202)

别样视野

二十一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世界

宣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7)
西方学术自由思想的历史演变述略	陈学飞 刘新芝(220)
美国大学教育观察	别敦荣(228)
小的就是好的	许纪霖(238)
从博士到教授	(美)杜维明(241)
美国的博士生培养及对我国的启示	曹 颖(244)
关于抄袭:我们知道多少	大 东(253)
“香港科大现象”及其启示	李稻葵等(257)
大学的角色和任务	陈维昭(265)

大 学 的 理 念

大学的理念

童世骏

3

专科学校升格为本科学校、某某学院升格为某某大学，再进一步，几所普通大学合并成一所超级大学，这在改革开放以后的我国高教界，已经司空见惯。对这种现象，可以作种种解释。从人才培养规格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高的客观需要，到学校行政级别提高、学校名称含金量提高的主观愿望，这些解释都只能说是从大学的外部因素出发所作的说明，而不是从大学的内在精神出发所作的理解。大学的内在精神，也就是德国人所说的“大学的理念”。

“大学的理念”(die Idee der Universitaet)，也可以叫做“大学的观念”，但译成“理念”，更能提醒人们注意形成这个说法的德国古典哲学背景。在提出和阐发“大学的理念”的过程中，费希特、谢林都起过重要作用。黑格尔虽然在这方面的作用不及这两位同胞，但他不仅后来担任过“大学的理念”之诞生地——柏林大学——的校长，而且还以其集德国古典哲学之大成的哲学体系，给后人对“理念”的理解打上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对于这些德国古典哲学家来说，有形的文化作品和社会建制是无形的理念的外在表现；文化和制度离开了内在的理念，就仅仅成了一具僵尸。大学之理念，也就是大学之灵魂、大学之生命。当然，理念之体现于外总是不完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理念与特定时期的文化和制度的关系又是一种理想和现实

的关系。谈论大学的“理念”，也就是谈论一种与现实有相当距离，我们可以用来衡量现实、批判现实的大学的“理想”。

现代大学制度之诞生的标志，是洪堡(W. von Humboldt)在1810年受命组建柏林大学。在柏林大学之前，欧洲已经有了不少大学，最早的可一直追溯到十二三世纪。从形式上看，柏林大学像其他大学一样仍然包括哲学、神学、医学和法学四个学院；但洪堡和柏林大学的其他精神之父们所阐发的大学的理念，为柏林大学灌注了独特的生命，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的始祖。洪堡等人的大学理念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的统一：大学活动的非政治性质与大学建制的国立地位的统一，科学体系的内在完整性和科学对整个文化和社会的批判-启蒙意义的统一，教学和研究的统一。

创建柏林大学的历史背景，是作为德意志最大公国的普鲁士在法国的攻击面前不堪一击，不仅割让土地，而且失去了几所重要的大学。也就是说，柏林大学的创建，是德国人努力用精神力量来补偿物质损失的一个结果；从一开始，柏林大学的办校宗旨就是服务于国家利益的。但在洪堡等人看来，为国家利益服务不等于放弃大学自主和学术自由。他们设法向统治者们表明：恰恰是这种大学自主和学术自由，才更符合普鲁士作为一个文化国家的根本利益。

这里所说的“学术”，德语的说法是 *Wissenschaft*。这个词大致对应于英语的 *science*，但又与之有重要区别。英语的 *science* 通常指自然科学，或者以自然科学为典范的数理-经验科学。但德语的 *Wissenschaft* 包括的范围则更广，不仅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且也包括我们通常所说的人文科学或人文学科——哲学、历史、文学和艺术。作为这种意义上的“科学”赖以存身的社会建制，大学(University 或 Universitaet)必须真正是“大学：不仅是学校规模大，而且学科范围广(universal)。只有以这样的科学核心的大学，才能培养洪堡所说的“全面人格”(vollstaendige Menschen)，才能成为全民族精神文化生活的典范和中心。从这个观点来看，所谓“纺织大学”、“交通大学”甚至“科技大学”，都包含了内在的逻辑矛盾。甚至那些没有哲学系的大学，也很难称得上名副其实。这不仅仅是因为哲学理所当然地属于广义的科学之列，而首先是因为这些门类众多的科学需要由哲学来加以统帅。

如果说以上两点(学术自由、科学统一)分别是“大学的理念”的否定的方面和肯定的方面话，那么，第三个方面，即教研并重，则是具体落实这两

个方面 的方法或者措施。大学作为教育机构,教学是题中应有之义,所以,强调教学与研究并重,重点在于研究。这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大学成了科学的研究的基地。德国的柏林大学,英国的皇家学会和法国的法兰西学院一起,开创了现代科学建制化的三种基本形式:科学学会、科学院和研究性大学。从教育史而不是科学史的角度来说,更重要的是第二方面,即把知识创新与知识传授内在地结合在一起,新人才在新知识的创造过程中培养出来,这样的新人才从一开始就不仅仅知道如何去掌握已有的知识,而且也知道如何去探索未知的领域。

二

在 20 世纪,大学的理念几度引起德国知识界的重新关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 1923 年,雅斯贝斯发表“大学的理念”一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雅斯贝斯在受命重建德国高教体系的同时于 1946 年以相同题目出了一书。1961 年,此书又出了新版。谈论“大学的理念”,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雅斯贝斯的论述。

雅斯贝斯的“大学的理念”,从其具体内容来说,仍然是上面讲的那几个方面。

雅斯贝斯强调大学自主和学术自由,认为自由是大学之生命的首要原则。从学生的方面来说,他们必须具有自我负责的观念,并带着批判的精神从事学习,因而他们必须具有学习的自由。从教师的方面来说,他们的责任是传播科学真理,因此他们必须有教学和研究的自由。

关于大学教育与科学的关系,雅斯贝斯指出必须分辨两种情况,一种是为适应今天科技生活所必需的科学教育;另一种是可以引导和充实人们生活的教育。大学教育之为大学教育,或者说体现“大学的理念”的大学教育,不在于前一种意义上的科学教育,或者说专业教育甚至职业教育,而在于后一种意义的科学教育,它所注重的是科学的本真意义,是科学的方法、基础和目标。在雅斯贝斯看来,科学的方法、基础和目标,是超越各门科学本身的,是需要借助于哲学而得到揭示和体验的。雅斯贝斯虽然不像洪堡和施莱尔马哈尔等人那样在机构上设置上主张哲学学院居于首位,但仍然主张哲学在大学的理念中具有中心地位:“大学的内在精神是通过每一个研究者及学者所表现出来的哲思活动为标志的。”

这种“哲思”活动，雅斯贝斯与康德一样认为应当成为大学生学习的重点。这样的思考活动是需要条件的，所以大学生必须学习既有的知识。但真正的哲思活动并不表现于科学的研究的结果之中，而表现于科学的研究的过程之中。这就是为什么“研究与教学并重是大学的首要原则”的缘故：“按照我们的大学理想，最好的研究者才是最优良的教师。只有这样的研究者才能带领人们接触真正的求知过程，乃至于科学的精神。只有他才是学问的本身，跟他来往之后，科学的本来面目才得以呈现。”

在雅斯贝斯的论述中，最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他所谈到的大学的理念和大学的建制之间的关系。大学的理念是要由相应的建制来保障的。19世纪中期以后德国之所以成为各国创建和改革其大学制度竞相仿效的榜样，主要不是因为这个民族的哲人们对大学的理念的阐述，而是因为这个国家的教育官员和教育专家们为体现这个理念所进行的制度创新。校长由教授会选举；从无薪讲师到正教授的一系列晋职考核制度；教师可以自由选择开设的讲座和研究的课题；学生可自由选择修读的科目和课程；大课讲演、小班讨论(seminar)和教学实验室中的研究相结合的教学方法等等，这些具体措施很快成为各国大学的共同设置。到了20世纪，雅斯贝斯所重视的不是要根据大学的理念来配置大学的建制，而是要防止大学的建制失去大学的理念，沦为空洞的形式。在雅斯贝斯看来，大学的理念、大学的理想，要靠每一位学生和教师来实践，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大学组织的各种形式则是次要的。“如果这种为实现大学理想的活动被取消，那么单凭组织形式是不能挽救大学生的。”在其哲学自传中，雅斯贝斯一方面表达了自己从童年起就形成的对于大学的崇敬——“学校的建筑、讲堂、传统的礼节对我都是神圣的东西”，大学“对我来说就意味着真理的化身”，另一方面也表达了这样的想法：在他的大学经历中，最使他痛心的并不是纳粹时期官方对作为自由精神之实现的大学的暴力摧毁，而是在纳粹上台以前大学内部已经出现的自由精神的衰退及大学教授和学生对自己崇高责任的懈怠。对雅斯贝斯来说，这意味着大学的终结。

三

1986年，在海德堡大学建校600周年的时候，尤根·哈贝马斯也发表了一篇以“大学的理念”为题目的演讲。在哈贝马斯作这个演讲的时候，大